

05 | 古典学
在中国

Graeco-Roman Classics
in China

Volume 1, Number 1, 2016

世界历史评论

The World Historical Review

陈恒 洪庆明 主编



荷马在中国

王焕生

我的治学之路

张竹明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

黄 洋

奥维德在西方和中国的译注史和学术史概述

刘津瑜、康凯、李尚君、熊莹

周作人与希腊神话

止 庵

对西方古典的矢志之爱——记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张竹明

陈仲丹

鲁迅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

陈德正、付超

全译梭伦诗残篇

张 巍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世界历史评论

The World Historical Review

陈恒 洪庆明 主编

05 | 古典学
在中国

Graeco-Roman Classics
in China

Volume 1, Number 1, 2016

文
景

Horizon

社 科 新 知 文 艺 新 潮

古典学在中国

陈 恒 洪庆明 主编

出 品 人：姚映然

扉页题字：刘家和

责任编辑：冯慧敏

美术编辑：高 熹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20mm 1/16

印 张：21 字 数：289,000 插页：2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ISBN：978-7-208-13971-8 / K · 25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学在中国 / 陈恒, 洪庆明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世界历史评论)

ISBN 978-7-208-13971-8

I. ①古… II. ①陈… ②洪… III. ①文化史-古希腊 ②文化史-古罗马 ③文化传播-研究-中国 IV. ①K125 ②K126 ③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6404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 录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 003 王焕生 荷马在中国
- 007 黄 洋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
- 026 刘津瑜 康 凯 李尚君 熊 莹
奥维德在西方和中国的译注史和学术史概述
- 095 李永斌 “东方化时代” 希腊宗教中的东方元素
——兼论比较宗教研究面临的难题及解决方法
- 110 白 钢 口传诗歌理论视野下的荷马史诗及其“深度”
- 123 罗 锐 古典学视野下现代汉语辞书的文献援引
- 144 张 炜 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

评 论 / Review Articles

- 165 张竹明 我的治学之路
- 171 止 庵 周作人与希腊神话

- 180 张绪强 从周一良致林志纯信札看古典学在中国
- 189 陈仲丹 对西方古典的矢志之爱
——记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张竹明
- 204 陈德正 付 超
鲁迅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
- 212 张绪强 林志纯先生与古典学研究
- 218 陈德正 阎宗临的《罗马史》手稿

书 评 / Book Reviews

- 227 李寒阳 一种世界性文明的兴衰、影响及反思
——汤因比的《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
- 236 张 弢 一专多用的学术史著作
——评晏绍祥著《古典历史研究史》(新版), 兼谈对古典学工具辞书的善用
- 247 薛冰清 美国革命史研究的颠覆性叙事
——读埃里克·纳尔逊著《王权派的革命: 君主制和美国的建立》

访谈 / Interviews

- 273 刘津瑜 古罗马诗歌汉译
——王焕生先生访谈录

文献与史料 / Sources and Documents

- 297 张 巍 全译梭伦诗残篇

- 321 **Contents and Abstracts**

- 328 征稿启事

专论 | Research Articles

荷马在中国

王焕生

中国和希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古代由于一个在亚洲东部，一个在欧洲，海陆相隔，距离遥远，阻碍了彼此之间的直接交往，使得双方的接触和了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间接的。在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史上，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当时许多传教士主要由海路，经过南亚来到中国。他们东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但他们在宣讲教理的同时，也传播了欧洲的科学和文化，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教士们在讲道中涉及欧洲古代文化比较多的方面是哲学和伦理学，但对文学也有涉及，并且往往从欧洲文化的源头谈起，引证古希腊文化。根据现有史料，《伊索寓言》中的一些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并且在 1625 年出版了《伊索寓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况义》（Hoang-I—Selectae Esopi Fabulae）。相对说来，中国人了解荷马史诗要比这晚一些。

19 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扩大了同欧洲各国的交往，从而也扩大了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读者对欧洲文学的了解，其中包括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了解。当时中国读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了解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一是来华的欧洲人士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里包括来华的欧洲官员、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文化人士。例如 1857 年创刊的《六合丛谈》杂志第一期上便发表了一篇由英国人艾约瑟撰写的介绍古希腊文学的文章，称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之祖，文

中介绍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二是中国人士出使或访问欧洲，回国后向国人介绍。他们在欧洲履职或旅行期间，对欧洲文化颇感兴趣，进行广泛的参观和阅读，做出笔记或撰写成书。例如 1877 年清廷大员郭嵩焘出使英国，所记日记就多次谈及荷马史诗，称荷马为欧洲诗人之最。又如单士厘随丈夫赴欧，途经罗马时曾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所写游记中对博物馆里陈列的许多雕塑作品进行介绍，从而介绍了许多古希腊神话传说，如金苹果、特洛伊木马、拉奥孔的故事等，实际上涉及荷马史诗的内容。三是中国学者的文学史著述和原作翻译。下面着重介绍这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学者早期的古希腊文学史著述通常是以欧洲文学入门或通论的面貌出现的，在普遍介绍欧洲文学的前提下，按时代顺序首先介绍古希腊文学。这类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 1918 年出版的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9、1920 年等曾多次再版。1922 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文学大纲》，介绍欧洲文学，其中第二章就专门介绍荷马史诗。认为荷马史诗的特点在于把古希腊民族发展早期的新鲜与质朴用完美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出来。这部著作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1930 年出版了方璧（即中国著名作家矛盾）的《西洋文学通论》，全书分十一章，第一章便是介绍古希腊罗马文学。同年还出版了于化龙编的《西洋文学提要》，书中分别概要地介绍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英、法、德等欧洲各国文学。此后数年内又出版了多种类似的文学史著作，都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表明了作者们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重视。此外，在这一时期还曾从英文、俄文等翻译出版了多部欧洲文学史著作。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上述通论性的欧洲文学史外，也有一些著作专门介绍古希腊文学的著作，例如：1930 年出版了方璧的《希腊文学 ABC》，书中把古希腊文学分为荷马时期、雅典时期、衰落时期进行介绍。1933 年出版的王力的《希腊文学》也是从上述三个时期对古希腊文学的发展进行介绍的。也出版过专门介绍荷马的著作，如 1924 年出版的王希和的《荷马》，1926、1930 年再版。书中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进行了介绍，对史诗艺术进行了评述，并设专章谈论“荷马问题”。总之，从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研究和介绍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热潮。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基本都是文化人——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他

们对中国古典文化一般都有精深的了解，同时希望借鉴欧洲文学成就，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人们出于对欧洲古代文明的向往，出于对古希腊文学成就的崇拜，从而对古代希腊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使得荷马史诗成为中国读者普遍知晓的欧洲古典文学名著。

对荷马史诗的翻译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荷马史诗的翻译起初是从英文转译，后来才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翻译形式包括译述、选译和全译。例如：

1. 1924 年出版的由王昌谟等编译的《欧洲名著节本》中，就包括有荷马史诗选段。

2. 1926 年和 1929 年分别出版了谢六逸根据英译本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要故事进行的译述。

3. 1929 年和 1930 年分别出版了高歌根据 T. Church 的英文散文译本译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4. 1943 年出版了诗人徐迟根据威廉姆·马立斯（William Marris）等七种英译本遴选翻译的《伊利亚特选译》，包括阿基琉斯的愤怒等，共有十五个片段，八百多行诗。这个译本的特点是用汉语五音顿现代诗体翻译原诗的六音步诗行，译本对每个选段的神话故事背景和艺术特点都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5. 1929 年出版了傅东华翻译的《奥德赛》全本。译本根据英译本转译，书前的“引子”详细介绍了史诗中的故事情节和特点，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史诗的评论。翻译用的是中文韵文体，分行，译文比较自由。后来他又用散文体根据赖尤（E. V. Rieu）的英译本转译了《伊利亚特》，于 1958 年出版。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进入一个新阶段，对外国文学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第一个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的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杨宪益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颇深，长期从事中译英工作。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用散文体翻译《奥德赛》，于 1979 年出版。他本来还准备翻译《伊利亚特》，但由于其他事务缠身，只翻译了第一卷的一部分。《奥德赛》译文古朴、忠实，受到读者称赞。

罗念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希腊文学专家。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开始翻译古希腊戏剧，包括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

女》《美狄亚》《阿尔刻提斯》等，后来他又翻译了许多古希腊戏剧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伊索寓言》和琉善的讽刺散文等古希腊文艺理论和散文、诗歌作品。现在我们已将他的全部著作编成全集，约350万字，分成十卷，增订版由北京世纪文景于2016年5月出版。罗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选译古希腊抒情诗时，选译了《伊利亚特》中部分富有抒情性的片段，如“赫克托尔与安德罗马克告别”“普里阿摩斯赎回赫克托尔的遗体”等，并译出了第二十四卷，然后他决定从第一卷开始翻译《伊利亚特》全诗。当时他已年逾八旬，身患绝症，但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一卷卷地翻译，一直译到第九卷。第十卷是在同疾病顽强抗争中进行的，但只及译至第475行初稿，便不得不搁笔，住进医院，于1990年4月与世长辞。

我是在1961—1965年期间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毕业回国后一直在罗先生的指导下，和罗先生长期一起工作，曾共同翻译、出版过《伊索寓言》《琉善哲学文选》《希腊罗马散文选》《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等。我们互相很了解，学术观点相投。罗先生在临终前出于对我的信任，嘱我在他之后继续翻译《伊利亚特》。我接受他的嘱托，译完了全诗，于1994年出版。在译完《伊利亚特》后，我又应出版社要求，翻译了《奥德赛》，于1997年出版。

两部史诗的译文力求忠实，语言保持原文的朴实而又崇高的风格，在形式方面采用的是六音步新诗体，以求与原诗的六音步相对应，同时在行尾韵和分行方面适当考虑中国诗歌的传统习惯。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很大，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只是尽可能去做。令人高兴的是这两个译本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好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曾于1999年一起荣获中国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奥德赛》又于2001年荣获中国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荷马史诗是中国读者普遍喜欢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这些褒奖也是对荷马史诗本身价值的肯定。

我们的荷马史诗翻译只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工作，在这方面还需要人们继续努力。

（王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

黄 洋

摘要：知识界一直有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或者“人民暴政”之说。本文追溯这一说法的起源及其在古代希腊的谱系，分析导致这一说法的原因，试图揭示它的谬误之处。随后本文力图论证，雅典民主政治事实上并非仅为下层公民的统治，精英阶层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并且这一所谓“直接民主”的形式是合理和行之有效的。

关键词：雅典 民主政治 暴民政治

从公元前 594 年的梭伦改革开始，雅典人经过了百余年的艰难探索，终于在公元前 5 世纪建立起一套全体成年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与决策的政治制度。在 2500 多年以前建立起这样的制度，实践这样的政治方式，其革命性本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对后世影响的深远度和广泛度无有出其右者。罗马人创造的共和制度也许影响同样广泛，但共和观念的影响却不如民主观念那样深远。然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雅典民主政治长期存在两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民主政治这一观念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想起源于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自希腊古典时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贬斥和否定以雅典民主政治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政

治实践。即便是到了民主政治受到普遍接受的现代，即便是真正接受民主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对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抱着疑虑态度。尽管他们不能也不会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但却试图建构一种精英式民主政治，因而事实上是排斥雅典式民主政治的。至于国内知识界，则至今都充斥着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的说法，甚至在专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中亦是如此。

如果说当时人对雅典民主政治抱有疑虑，倒也不难理解。毕竟任何社会及其成员都天然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对于新生事物不免带着怀疑态度。今人的怀疑态度则要难以捉摸得多。诚然，雅典的民主，是在一个有限公民群体范围内实行权力的分享与平等参与。确切地说，是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也许占到人口一半甚至更多的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自不待言，即连名义上享有公民权的妇女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利。对于这种排斥性的质疑无疑是合理和正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和绝大部分地域，政治权力都是操纵在极少数统治者乃至个人专权者手中，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包括自由的男人、女人、奴隶（如果存在奴隶的话）——非但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权利，甚至没有知情权。即使是今天，也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并不赋予绝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男人和女人）政治参与权。如果考虑到这些，再回望 2500 年前的雅典，应该不难理解其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意义，并且不能不惊叹于古人的创举。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到底为什么人们对雅典民主政治持如此明显的怀疑态度。

—

那么，为什么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疑虑难以消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古代希腊，看看雅典民主政治引起的争议，其焦点何在。涉及民主政治的争议，最早明确出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之中。这位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在记叙波斯贵族杀死僭权的马古斯（magus）们时告诉我们，政变者对于将要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之一欧塔

涅斯 (Otanés) 主张不再采用君主制, 因为它使君主“随心所欲而毋需负责”, 最为糟糕的是, “他凌驾于国家的法度之上, 蹂躏妇女, 未经审判而随意杀人”。为此他建议采取“多数人的统治”, 因为首先, 它“拥有最为美好的名称, 即 *ισονομίη* (isonomiē); 其次, 它避免了君主的所有那些恣意妄为; 官员抽签统治, 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且所有决议均共同做出” (III. 80)^①。另一位参与政变的贵族迈加比佐斯 (Megabyzos) 则提议采取寡头政治, 因为在他看来, 多数人的统治甚至较君主制更为恶劣: “没有什么比一无是处的乌合之众更为愚昧和恣意任性的了。而且为了逃避暴君的恣意妄为而倒向无法无天的民众的恣意妄为, 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前者至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后者却对自己的行为一无所知。他们既无教育, 又未曾见识美好且适度的事, 像一条湍急的河流急切而无所用心地处事, 又怎么能知晓呢? 让波斯的敌人采用民主制吧, 而我们则选择一批优秀人士, 让他们掌权吧。” (III. 81) 大流士 (Darius) 则力主维持君主制, 其理由是寡头制易于导致寡头之间的敌意和争斗, 乃至血腥冲突, 最终仍然导致君主制。民主制则必然导致邪恶之人的出现, 他们狼狈为奸, 危害共同体, 直至民众领袖挺身而出铲除邪恶。但这时他就为民众崇拜而转变成了君主。这也说明君主制是政治统治的最终归宿 (III. 82)。

希罗多德这段令人饶有兴味的记载其实是希腊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片段。虽然它穿插在关于波斯宫廷政治的叙事中, 但有足够的理由认为, 这段关于政治制度的争论不可能发生在波斯的贵族之间, 或是反映波斯人的政治思想, 因为事实上, 波斯从来没有采纳过君主制以外的任何政治制度。而希腊的城邦为数众多, 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各不相同。这使得希腊人对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更明确的认识。所以说, 希罗多德的记载更真实地反映了公元前 5 世纪后期希腊人的政治思想以及对不同政治制度实践所带来的争论。尤其是, 雅典民主政治这一比以往任何政治制度都要激进得多的政治实践, 业已激发了希腊知识分子对于何为最好政体的激烈争论。希罗多德虽不是雅典人, 但长期居留雅典, 对雅典民主政治有着近距离观察。他虽为历史学家,

① 除特别说明外, 古典文献引文均为笔者自译自古希腊原文。

但无疑也对不同政治制度的差异产生兴趣。在波斯宫廷政治叙事中穿插的这段政体争论，正是他本人对此产生兴趣的体现。^①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他将民主政治称为 *ισονομία* (*isonomiē*, III. 80) 和 *δῆμος* (*dēmos*, III. 82)，前者的字面意思是“法律面前平等”，意味着民主政治强调的是平等的权利；后者也是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后来用来指称民主政治的标准词语 *δημοκρατία* (*dēmokratia*) 虽然没有在此处出现，但希罗多德却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语的希腊作家。在记叙西居昂 (Sicyon) 僭主克里斯提尼招婿、最终选中雅典人迈加克勒斯 (Megacles) 为女婿时，希罗多德看似不经意地提到，这个联姻的结果是生下了克里斯提尼 (以其外祖父名字命名)，他“重新组织了雅典的部落，并且在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 (*δημοκρατία*)” (VI. 131)。在另一处有关记叙中，他又将雅典民主政治称为 *ισηγορίη* (*isēgoriē*, V. 78)，其意则为“平等的发言权”，同样强调平等之意。这些词语的使用，说明雅典这套新兴政治制度的称呼，尚未完全达成约定俗成的说法。

希罗多德的这段记叙也是西方甚或整个政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传统认为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政治学，其元问题正是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早于柏拉图半个多世纪以前，希罗多德就已经借波斯人之口，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进行了初步的但却具有导向性的探讨。或者说，希罗多德记载的争论表明，至迟在公元前 430 年左右，希腊知识分子业已提出了政治学史上的这个元问题。雅典民主政治实践所激发的希腊知识界关于政治制度的激烈争论，历时半个多世纪，最终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而发展出西方的政治学这一门学问。因此可以说，公元前 5 世纪希腊知识分子关于政体的争论，其实是西方政治学的前史。^②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政治学的前史上，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一组关键指责即已显露无遗。希罗多德笔下的迈加比佐斯显然把民主政理解解为除却精英成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统治。而在他看来，这些普通民众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愚昧、缺乏教育而无知、恣意任性而缺乏理性——其心性“像

① David Asheri, Alan Lloyd, Aldo Corcella,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I-IV*,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71-473.

② 参见拙文《希腊罗马的城邦政体及其理论》，载王绍光主编：《理想政体：中西古今的探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

一条湍急的河流”。换言之，他们是一群暴民，而他们的统治则是暴民政治——愚昧无知而又缺乏理性的大众的集体统治。

对民主政治的这种否定性评价也许并不代表希罗多德本人的看法，因为同是在《历史》中，他高度肯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公元前 506 年，在雅典推翻僭主统治、建立起民主政体不久，城邦即面临了空前严峻的局面：这年斯巴达组成包括科林斯在内的强大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其二位国王克里奥美尼（Cleomenes）和德玛拉图斯（Demaratus）为统帅，亲率盟军进攻雅典，占领其宗教圣地埃琉西斯（Eleusis）。与此同时，以忒拜为首的贝奥提亚联军从西北面入侵，尤卑亚岛的卡尔基斯（Chalcis）则从北面进攻雅典（V. 74）。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雅典人民众志成城，不仅成功地抗击了三面来袭的强敌，迫使伯罗奔尼撒盟军撤退，大败贝奥提亚联军，而且攻入尤卑亚岛，占领卡尔基斯城。^①由此雅典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希罗多德就此评价道：

这样雅典人的力量与日俱增，不只在一方面、而且在所有方面都表明，民主政治（ἰσηγορίη）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当雅典人处在僭主统治之下时，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的邻邦强。但在推翻僭主之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战士。这说明，当受到压迫之时，他们故意装出懦弱；而当获得自由之时，他们每个人都甘愿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竭尽全力。（V. 78）

也许正因为迈加比佐斯的态度并不反映希罗多德本人的看法，这段记载才更显其意义。它意味着，如此否定民主政治代表了某种具有影响力的立场，并因此而受到希罗多德的注意。无论如何，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它无疑反映了社会精英阶层成员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对他们而言，民主政治即等同于普通公民的统治，也就等同于“暴民政治”。大约和希罗多德同时代的一位佚名

^① 希罗多德：《历史》，V. 77；参见 Russell Meiggs & Davi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年修订版（1969 年初版），No. 15, pp.28-29。